

巴勒斯坦斗争方式的演变

杨 辉

内容提要 巴勒斯坦人民、组织、政党在反对以色列军事占领的斗争中，追求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同时，为达此目标还确立了一整套相应的斗争方式。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历程显示，他们的斗争方式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武装斗争是解放的惟一正确方式；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武装斗争与外交斗争并举；80年代后期至今，以和谈为主要方式。总的来说，巴勒斯坦斗争方式演变的主流是从武装斗争逐步地转变到政治外交斗争，即和平谈判。但是，在这个演变中，巴勒斯坦内部不时产生分歧，并成为巴内部和平进程的干扰因素。

关键词 巴勒斯坦 斗争方式 演变

作者简介 杨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西安 710069）。

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斗争方式的确立者、代表者和实践者，也是斗争方式不断演变的推动者。随着国际形势和中东局势的发展变化以及阿以之间实力的消长，巴解组织审时度势地调整了斗争方式，为开启巴以和平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巴以冲突的最终合理解决做出了贡献。

武装斗争是解放的惟一正确方式

在巴解组织成立以前，以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组织已在各地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宣传武装斗争的思想。在法塔赫组织早期出版的刊物《我们的巴勒斯坦：生命的呼喊》中曾明确指出：“收复巴勒斯坦的惟一方式是通过军事暴力，战斗将决定巴勒斯坦人的命运。”¹自1965年1月起，法塔赫正式开展武装斗争。1966年下半年，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所属的“归国英雄”、“复仇青年”等组织也开始进行武装斗争。1967年12月11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人阵”）在成立宣言中声称“武装斗争是惟一行之有效的方式；敌人懂得的惟一语言是革命的暴力”^④。但是，时任巴解组织主席的舒凯里没有采纳各抵抗组织的建议，也没有把武装斗争提上巴解组织的议事日程，引起了各抵抗组织的强烈不满。1968年7月，在巴解组织第四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法塔赫等主张进行武装斗争的组织占据统治地位。会议对1964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国民宪章》进行了重大修改，突出了武装斗争的思想，其中明确规定，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惟一正确途径，还规定游击队行动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的核心。^④新的《国民宪章》强调武装斗争的措辞有10多处。

通过修改《国民宪章》，巴勒斯坦斗争方式最终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被确立下来，成为各抵抗组织

¹ Riad El-Rayyes & Dunia Nahas, *Guerrillas for Palestine*, Croom Helm Ltd, 1976, p. 28.

^④ Ibid.

^④ See Aryeh Y. Yodfat and Yuval Amon Ohanna, *PLO Strategy and Tactics*, Croom Helm Ltd, 1981, pp. 147-153.

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指导方针。当时,各抵抗组织在不同程度上以此方针为指导,进行武装斗争。据悉,“法塔赫从 1965 年 1 月到 1968 年底,共歼敌 3 700 名。在 1969 年中,巴勒斯坦游击队共发动了 3 900 多次军事行动,打死打伤以军 1 300 余人,其中法塔赫的军事行动为 2 400 多次,人阵的军事行动为 383 次,民阵为 205 次。”¹ 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阿布·伊亚德在其著作中透露,1967 年游击队攻击(以色列)的次数每月为 12 次,1968 年月均 52 次,1969 年月均 199 次。1970 年前 8 个月月均 279 次。^④ 虽然此后攻击的次数有所减少,但是武装斗争从未停止。

与此同时,巴解组织明确表示反对各种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计划和决议,其中最主要的是:不承认 1967 年 11 月联合国安理会 242 号决议;反对 1969 年苏联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和平计划;拒绝接受 1970 年 6 月美国提出的《罗杰斯计划》;坚决谴责 1972 年 3 月约旦国王侯赛因提出的阿拉伯联合王国计划;明确拒绝 1973 年 10 月 22 日联合国安理会 338 号决议,等等。总之,直到 1974 年中期以前,巴解组织拒绝一切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式,继续高举武装斗争是惟一正确方式的旗帜。各组织在斗争方式上也保持一致立场。

武装斗争和政治外交斗争并举

1974~1988 年,巴勒斯坦的斗争方式从“武装斗争是惟一正确方式”转入到武装斗争和政治外交斗争并举的历史时期。斗争方式的灵活多样为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行的条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赏。这种变化的转折点是 1974 年 6 月举行的第 12 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巴解组织内部在战略目标和斗争方式上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四) 关于斗争方式,巴解组织内部出现了 3 种不同意见,法塔赫等组织认为,如果 242 号决议被修改,不再把巴勒斯坦问题称做难民问题,一旦巴解组织接到邀请就应参加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人阵等组织则完全拒绝出席这次会议,认为这样做等于放弃了武装斗争。两派争执不下,后来出现了第三种意见,即:建议巴勒斯坦领导人一旦接到出席这次会议的邀请,再召开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是否赴会。与此同时,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十点纲领》中提出巴解组织必须用一切手段进行斗争,主要是武装斗争。这表明:在斗争方式上,巴勒斯坦冲破了以前规定的武装斗争是惟一正确方式的框架,说明除武装斗争外还有其他斗争方式;同时,巴勒斯坦官方文件把斗争方式的变化确定了下来。1974 年 11 月,阿拉法特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把巴勒斯坦的斗争方式形象地比喻为:一手拿来福枪,一手拿橄榄枝。随后,在 1977 年 3 月举行的第 13 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斗争方式的变化更加明确,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强调用各种形式进行斗争,无论是军事的、政治的,还是群众性的”,同时,还明确要求巴勒斯坦人“在加强军事斗争的同时,加强其他一切形式的斗争”^{1/4}。此外,首次明确宣布,巴解组织有权“独立、平等地参加有关巴勒斯坦和有关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冲突的一切国际会议和努力,以争取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1/2}。

巴解组织在斗争方式上会出现变化主要原因是:(1)在 1973 年 10 月战争中,阿拉伯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未能收复全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此后,法塔赫组织的高层人士认为,“不管巴勒斯坦游击队发展得多么快,战斗力多么强,但它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战胜这个犹太复国主义

¹ 参见《人民日报》,1970 年 1 月 23 日。

^④ 参见阿布·伊亚德著;阎瑞松译:《不回故乡,毋宁死亡》,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印,1983 年,第 87 页。

^(四) 有关战略目标演变的详情请参阅拙文:《巴勒斯坦战略目标的演变》,载《西亚非洲》,2002 年第 6 期,第 8~12 页。

^{1/4} 钟冬:《中东问题 80 年》,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9 页。

^{1/2} Muhammad Musil, “Towards Coexistence: An Analysis of the Resolutions of the 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No. 4, 1990, p. 22

国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¹。这表明巴勒斯坦领导人对武装斗争是惟一正确方式的定位开始进行反思。(2)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7月,巴勒斯坦游击队在约旦遭到残酷镇压,元气大伤,同时失去了在约旦进行武装斗争的基地,使武装斗争的条件变得更加困难。(3) 十月战争后,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斡旋和主导下,埃及和叙利亚分别于1974年1月和5月31日同以色列达成“军事脱离接触协议”,且收复了部分被占领土,埃及同以色列直接谈判为巴勒斯坦斗争方式的变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4) 为了迎接在巴勒斯坦前线的“脱离接触”,斗争方式的变化成为脱离接触必备的条件之一。但遗憾的是巴以之间的脱离接触未能实施。

20世纪80年代,巴解组织再次调整斗争方式,如果说此前是把武装斗争摆在首位,那么,从此时开始则把政治外交斗争摆在首位。主要原因是在1982年6月以色列发动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中,巴解组织武装力量受到重创,随后被迫撤离该国并分散在8个阿拉伯国家,痛失进行武装斗争的最后一块基地;巴解组织总部也撤到远离前线的突尼斯。这样就使武装斗争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

从此,巴解组织主流派和阿拉法特主席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动和实践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特别是对当时有关方面提出各种方案、计划,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82年9月,阿拉法特主席和巴解组织主流派有条件地接受了《里根方案》,尤其是阿拉法特不顾一些组织的反对,多次申明《里根方案》有积极意义,不要一概反对。随后,他接受了阿拉伯《非斯方案》和苏联的《6点计划》。1983年岁末,阿拉法特主动访问埃及,对埃以单独媾和采取默许态度,同时向外界传递出巴勒斯坦同埃及一样走与以色列和谈道路的信息。1983~1985年,阿拉法特多次访问约旦,与侯赛因国王协商,并达成约巴协议,与约旦联合行动,试图通过谈判在约巴邦联的框架内实现巴勒斯坦立国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第17次巴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巴解组织首次声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合适框架是在联合国主持下,由安理会和其他各方包括巴解组织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国际会议”^④。第18次全国委员会会议进而详细地重申了上述立场。这表明谈判和政治解决实际上成为巴勒斯坦首选方式。

毋庸讳言,巴解组织内部对斗争方式及战略目标的变化意见不一。1974年10月,人阵、人阵(总部)、斗争阵线和阿拉伯解放阵线等组成“拒绝阵线”,反对政治外交解决方式,要求进行武装斗争,解放巴勒斯坦。1983年,法塔赫组织内部发生分裂,反对阿拉法特的派别声称坚持武装斗争、主张召开会议,纠正他的“错误路线”。此后,巴解组织也分裂成“民主阵线”、“民族阵线”和法塔赫为代表的巴解组织主流派。阿拉法特顶住压力,继续推动斗争方式的变化,且逐步地把谈判和政治外交斗争放在首位,致使一些巴勒斯坦评论家挖苦说“非武装斗争”变成了运动的特点。^④

和谈变为主要方式

从1988年11月以来,巴勒斯坦把和平谈判作为立国的主要方式,坚定不移地积极推动和平进程深入发展,武装斗争一词在各次会议的决议、声明及阿拉法特主席的讲话中销声匿迹。

1988年11月,巴解组织召开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巴勒斯坦斗争方式再次变化的转折点。会议通过的《政治纲领》和《独立宣言》,以及一个月后阿拉法特在日内瓦的声明一起,组成了巴解组织的和平战略。这些文件首次承认了以色列的合法存在,承认了联合国181号分治决议及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标志着巴勒斯坦在战略目标和斗争方式上的重大变化。^{1/4} 在《独

¹ 阿布·伊亚德著;阎瑞松译:前引书,第191页。

^④ Muhammad Muslih, op. cit., p. 23.

^④ Ibid., p. 22.

^{1/4} 有关战略目标演变的详情见拙文:《巴勒斯坦战略目标的演变》,载《西亚非洲》,2002年第6期,第8~12页。

立宣言》中,巴解组织宣布:“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决议,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它拒绝以武力、暴力或恐怖或者使用武力、暴力或恐怖来威胁它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¹。由此看来,宣言不但未提武装斗争,相反提出拒绝武力、暴力和恐怖。很明显,政治外交方式取代了军事方式。此后,阿拉法特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巴勒斯坦“摒弃恐怖主义”。

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美国在中东主导地位的建立,苏联(随后是俄罗斯)对中东激进国家支持有所弱化,阿拉伯抗以阵线有所削弱,因此在实践中,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继续贯彻执行和平战略和通过谈判和平立国的方针:

1. 积极领导 1987 年以来在加沙地带和西岸爆发的“英提法达(起义)”,并使其尽可能地保持在“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范围内,尽量不使“石块战”升级为“枪战”。

2. 20 世纪 90 年代,以色列顽固坚持不同巴解组织谈判的立场,巴解组织被排除在马德里中东和会之外,但阿拉法特主席仍以大局为重,不顾有些组织的反对,做出让步,同意由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代表团参加于 1991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马德里和会,且热情地支持、指导以后举行的巴以和谈。

3. 当巴以和谈没有取得实质进展时,从 1993 年 1 月开始,阿拉法特主席采取主动,与拉宾政府的代表在挪威奥斯陆进行秘密接触、谈判,最终达成《奥斯陆协议》。巴以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折性变化。同年 9 月 9 日,在致以色列总理拉宾的信函中,阿拉法特再次保证:“巴解组织摒弃恐怖主义及其他暴力行为,并将对巴解组织的所有组织和人员承担起责任,保证他们遵守纪律,防止出现违反纪律的人员和事件。”^④这充分表明了巴勒斯坦致力于和平谈判的决心和诚意。为此,阿拉法特曾获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和平战略的肯定和认同。

4. 1994 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1996 年,阿拉法特当选为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巴方继续坚持推进《奥斯陆协议》以来的巴以和平进程,并且制止和谴责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众所周知,巴勒斯坦和平战略和《奥斯陆协议》受到巴内部一些组织的反对,10 个激进组织成立“民族民主伊斯兰阵线”、且用暴力方式试图阻止协议的实施及和平进程的深入发展。“从 1994 年起直到 2001 年底,所有的自杀性炸弹爆炸事件毫无例外是由反对阿拉法特、反对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巴勒斯坦组织所为。在不止一次的情况下,由阿拉法特的安全部队对这些组织进行镇压,带来的问题是巴勒斯坦已处在内战的边缘。”^⑤例如:针对 1994 年 10 月的一起绑架事件,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在加沙逮捕了 400 多名“哈马斯”的积极分子,包括其领导人伊卜拉欣·亚祖里。^{1/4}1999 年 10 月 29 日~12 月 23 日,巴方曾把哈马斯精神领袖谢赫·亚辛在其寓所软禁两个月。哈马斯发言人兰提斯也曾被巴方关押。2001 年 10 月 17 日,人阵所属的组织暗杀了以色列旅游部长泽维,对此,巴民族权力机构发表声明对事件进行谴责,宣布该组织的“穆斯塔法旅”为非法组织,且逮捕了 40 多名人阵成员,同时还拘留了其领导人阿赫马德·沙达特。^{1/2}

5. 阿拉法特以民族解放事业的大局为重,在遭到以色列围困下按照美国的要求,推动巴勒斯坦各方面的改革,表明他继续执著推进和平进程的决心,为中东和平“路线图”的出台创造了必需的条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主流派是巴勒斯坦和平战略的制定者、推动者和执行者。巴以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和平谈判是解决巴以问题的现实、正确方式。在现阶段,巴以之间的和平离不开阿拉法特的推动与支持。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邢永平)

¹ 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 100 年》,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6 页。

^④ 马哈茂德·阿巴斯著;李成文等译:《奥斯陆之路——巴以和谈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5 页。

^⑤ Khalidi Walid, “The Prospects of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No. 2, 2003, p. 56.

^{1/4} Wendy Kristiansen, “Challenge and Counter Challenge: Hamas’s Response to Oslo”,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No. 3, 1999, p. 24.

^{1/2} “Quarterly Update on Conflict and Diplomac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No. 1, 2002, p. 135.

Fragile Nation— building: Assessment of U. S. – Iraq Policies on the Occasion of Sovereignty Transfer

Da Wei & Li Shaoxian

pp. 10– 16

From May 2003 to June 2004, the United States has finished the initial tasks of nation building in Iraq, whose central aim has made certain progress with a new regime being established in Iraq. However, security and economic issues and the hesitation of the masses make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particularly fragile. Three features can be discerned in America's nation

building efforts in Iraq, i. e. unilateralism, disparity between strategic determination and tactics, and Lebanonization of power sharing. All these pose difficulties to the Iraq's nation building. After June 30, 2004,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ke concessions in order to gain advantages and gradually achieve its strategy of "controllable withdraw".

Evolution of Struggle Forms in Palestine

Yang Hui

pp. 25– 28

The ultimate strategic aim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their organizations and parties during the struggles against Israeli military occupation is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Palestinian state. To realize the aim, a whole series of relevant forms of struggle was devised, in which remarkable changes took place during the course of Palestinian people's struggles. Before the mid- 1970s, armed struggle was the only way for

liberation. From the mid- 1970s to the late 1980s, armed struggle and diplomatic struggle were carried out concurrently. From the late 1980s to now, peace talk is the main form of struggle. During this gradual transition, differences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in Palestine, which often cause complications to the internal peace process.

Religious Factors to Civil War in Sudan

Jiang Hengkun

pp. 34– 40

The Civil War in Sudan is by far one of the longest, most complicated and most sticky civil wars in the world history.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its outbreak and continuance include various issues concerning religion, race, identity, legacy of colonialism, power sharing,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external influences, of which the religious issue is the most decisive one. Conflicts between Islam in the North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South exerted underlying influences on the

outbreak, duration and tendency of the war. In a way, Civil War in Sudan is the result and embodiment of the religious conflicts. Inherent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points of the two religions are the essential reason for the conflict and forecast numerous difficulties in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pute. True peace and unity wouldn't be realized without true inter- religious equality and amity.